

●灯下谭红

《红楼梦》对《西厢记》《牡丹亭》等的超越

赵建忠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是《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曹雪芹将王实甫、汤显祖的作品直接写入回目,足见其推崇。先是描写了宝黛共读西厢,贾宝玉展开《会真记》,林黛玉“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接着描写了林黛玉听唱《牡丹亭》,她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当听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想起古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句,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共读西厢”和“独品牡丹”这两个情境,令人如醉如痴。

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王实甫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同时能体会到草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他通过《西厢记》,热烈讴歌青年男女的爱情,发出了“愿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呐喊,这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但比较《西厢记》与《红楼梦》,张生仍热衷科举,迥异于贾宝玉的蔑视功名。崔莺莺的境界,与林黛玉相比,也有天壤之别。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文化含量和灵魂含量的爱情;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通过“庭园叙事”的方式,展现了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让杜丽娘感受到生命力的震颤。她在满园春色中唤醒了“自我”意识,与大自然的“姹紫嫣红”形成了共鸣,于是乎上演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传奇剧。然而与《红楼梦》相比,《牡丹亭》并没有打破中国戏曲和小说传统“大团圆”的俗套,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结合,最终仍凭借皇帝赐

婚,而《红楼梦》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结局。

《红楼梦》不仅超越了《西厢记》与《牡丹亭》,也超越了其他中国古代文学代表作。以贾宝玉推崇的《庄子》论,曹雪芹虽未摆脱道家虚无思想,但吸纳其思想精华的同时,言情中更具禅宗深度。端木蕻良曾指出曹雪芹“师楚”,贾宝玉创作的《芙蓉女儿诔》具有《天问》的想象力,但屈原局限于对大自然的追问,而《红楼梦》是对人存在意义的叩问。被鲁迅高度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记录了三十世家,但曹雪芹能以一座贾府去囊括百千世家。

即使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也曾做过“翰林待诏”,而曹雪芹“羹调未羡青莲宠”。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

在林黛玉《葬花辞》前也黯然失色,因后者超越了具体历史语境而进入形而上的生命语境。元明优秀的杂剧、传奇如前所述,思想高度并未超越《红楼梦》。与同时期的明清小说相比,文人独创的《金瓶梅》别开生面,脂砚斋承认《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这部小说虽刻画了系列女性形象,但大多不具正面意义,《红楼梦》用长篇小说的形式为女性塑造了正面群像。《三国演义》中的貂蝉是男人的附庸,罗贯中追求的“明君贤相”理想模式,仍在儒家思想的框架内。

曹雪芹经历了生命的大起大落,对人生思考后大彻大悟。《红楼梦》的深度在于打破了千古以来许多人打不破的名利迷关,呼唤生命所本有的一切,才抵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罕至的境界。



朱墨锦鳞聚一纸,迎头却道不相识。敢问诸君来何处?依稀犹记汉城池。——题《朱墨锦鲤图》

这张《朱墨锦鲤》是画家与拓手反复切磋的“产物”。以往李瑾拓鱼,往往是一纸一鱼,一般把古砖上的鱼纹拓在纸的上方,留下下半部的空白,便于书家题诗作画。

那天,王洪增和刘燕萍来到北京寄茶斋,商量如何创作一些不同以往的新作。洪增翻阅着李瑾刚拓好的一些鱼纹砖拓,轻轻摇摇头,说,这样的形式,很难画,很难画。李瑾问,怎么难画了?他说,一张纸上一条鱼,空间给固定死,倒适宜书法家题字,到了画家手里就不好调度了。“那怎么安排才合适呢?”李瑾问。洪增在一张四尺对开的方纸上,用铅笔画了几个圈圈,说,“你要是把鱼砖散开了拓,把空间拉开了,我就好摆布了……”

李瑾一看就明白了:拓片在画面上要分隔开一些距离,以利于画家施展拳脚。于是,李瑾找出三块鱼纹古砖,依照洪增兄的“圈圈”,拓出了这件“半成品”。洪增兄拿去以后,在墨拓鱼纹之间,穿插点染,辗转腾挪,画出了九条朱砂锦鲤,一下子就把静止的鱼拓,“搅动”得满纸跃动,生机勃勃。

看着这幅动静相宜、朱墨相间的鱼跃图,我的诗思一下子被拉到了鱼纹砖所属的年代,那是大汉王朝吗?而当这些“墨鱼”被拓印出来,与一群鲜活的锦鲤相遇时,它们会作何感想呢?它们会不会打个招呼,互问来路呢?

就在这一念之间,诗句自然流出了:“朱墨锦鳞聚一纸,迎头却道不相识。敢问诸君来何处?依稀犹记汉城池。”那些墨拓的鱼纹,或许还记得当年的大汉城池吧?

艺术家从来是造境的高手,将寻常之物重新排列组合,制造出某种引人入胜的画境,进而幻生出诗意的联想,令观者受到美的感染,进而生发出感慨和感动,这不正是书画之美的魅力所在么?于这幅《朱墨锦鲤》而言,我就是第一个观者,我用浅显的诗句,写出读画之所感,题于画面之上,其实也就给后来的观者,当了一个“导读”而已。

●网络新词语

心型感冒

赵超

“心型感冒”指的是因生活压力过大造成心理上的轻微疾病状态。它的“症状”包括陷入自我精神内耗、经常性焦虑和自我否定、自我价值感缺失等。该词将这些心理状态比喻为“感冒”,因为它们和感冒一样,虽不致命但需要时间去疗愈。

上山下乡的年月,农场连队里一些农友的绰号很有年代特色。

有个比我早去农场的农友,大名没人叫,许多人也叫不出他的名字,但他的绰号很出名,大家叫他“长工”。我不清楚是否因为他擅长干农活儿而这样称呼他。有传闻他能一下子吃下半铅桶饭。乖乖,了不得。

那年月在农场,吃饭是一种享受。当年我也有贪食一餐吃一斤一两饭的纪录。那时的白米饭确实香糯,很

好吃。

还有个农友,大家叫他“酱油”——他曾拿酱油拌饭吃。白白的米饭拌上红红的酱油,油光闪亮,咸鲜滋味忘

绰号

周云海

不了。另有位农友被喊做“三号牛”,因为连队里曾有头耕牛,按编号起名为“三号牛”。这位农友是连队里干农活儿的骨干,这绰号也许

是大家褒赞其干农活儿像“三号牛”一样有劲儿。

蔬菜班里有名女职工,我忘记她的名字了,但记得她的绰号叫“后幅势”。这源于她当年穿的一件上衣款式,就是那种衣服后背衣片,有后幅横条拼贯至两侧腋窝部位的式样。这样普通的服式,在今天不会让人有异样感,但在当时也算是别致的款式了。尽管日月如梭,但我抚摸着岁月的包浆,那远逝了的青春依然鲜活深刻。

连载

一道街的小院儿

第一季 胡同人家 下部

王传林

九、可真是大事

趁柏先生翻看报纸的工夫,齐秀萍忙着照顾仨孩子吃饭。

突然,柏先生兴奋地抖着报纸大声说:“大事!绝对的大事!”

“什么大事啊?”“改币啦!”“真的?”

柏先生指着报纸,一脸兴奋:“可不是咋的!说改就改!我念给你听听。”

柏品正插嘴问道:“什么叫改币啊?”

柏先生对儿子说:“币,就是货币,就是钱啊!票子,钞票!”

“那干啥要改呢?”

“原来的钱毛了,改后,就不毛了。”

柏品正认真地追问:“什么叫毛了?”

齐秀萍接口道:“钱毛,就是钱不值钱了。”

柏品正看上去似乎还是不懂。柏先生便说:“眼下买东西,动不动就是成百上千块钱,一根针也得一百块。现在好了,改了,一根针一分钱……”

柏品瑗也插话问:“那一千块钱呢?”

柏先生指着报纸:“一千元就是一角钱,一万元就是一块钱啦!”

柏品瑗反应快:“那妈妈给人家织毛衣就是六块钱一件了。”

柏品正也好像明白了:“那烧饼馕子就是五分钱一套了!”

齐秀萍笑道:“一挑水就是两毛钱了。”

柏先生赶紧接着话茬儿:“咱们的房钱就是一个月三块钱了……”

全家人都大笑起来。这是一个难得的畅快温馨的夜晚,新生活的曙光仿佛开始照进这个处于艰难困苦中的

家庭。

第二天,柏先生又很早起上班去了,毕竟,他的那辆“小二六”自行车,从老城里到三条石要骑很长的时间。

吃罢早饭,收拾妥当,齐秀萍手拿一把榔头,臂下挟着个小木牌儿,叫儿子搬着一个木凳儿,跟随自己来到院门口儿。

“来,小儿,扶着妈站凳子上。”

齐秀萍在凳子上站稳,然后“叮叮当当”把小木牌儿钉在了墙上。

差不多要钉好了的时候,院门开了,常玉科从里面走了出来。

常玉科抬头见齐秀萍在干这种力气活,惊奇地问:“是你?钉什么呢?”

“哟,你在家啊?没有吵到你吧?真对不起。”齐秀萍显得有些忐忑不安。

常玉科抬头看了看木牌儿上的字,嘴里念着:“手织毛衣,齐氏。”

齐秀萍看小木牌儿固定好了,便打算从小凳上下来:“小儿,来扶我一把……”

常玉科见状,赶忙伸手搀了一把齐秀萍。

曾延毅旧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让这座古城免遭战争劫难。傅作义、傅冬菊父女功不可没。在天津,还有一对父女,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这就是曾延毅和曾常宁。

1948年3月,正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地下党员曾常宁接受了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布置的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刘仁同志跟我说,曾常宁我现在要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你去你父亲的工作,让他给我们做工作。”曾常宁说(出自1999年采访资料)。

曾常宁的父亲曾延毅,湖北黄冈人,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国民党第35军中将,太原戒严司令。此时,他正隐居在天津市常德道1号的这座小楼中,过着不问世事的寓公生活。已经下野的曾延毅,与傅作义的关系非同寻常。

考入南开大学前,曾常宁和弟弟曾亚宁都在耀华学校读书,并先后成为共产党员和民主青年同盟成员。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军官,曾延

毅对共产党没有敌对情绪,对儿女的革命活动持默许态度。耀华党支部还派出党员教师刘子安做曾延毅的工作。地下党分析了曾延毅的政治态度,陆续将一些地下活动地点转移到曾延毅家中,这些活动大多得到曾延毅无声的支持。

接受任务的曾常宁回到家与父亲几次长谈,曾延毅欣然同意前去北平争取傅作义,并提出一个建议。“他说最好先做刘厚同的工作。刘厚同是傅作义和曾延毅在保定军校的老师,傅作义很重视他,还聘他做参议。他容易见到傅作义。”时任南开大学北系地下党支部书记沙小泉介绍。

1948年夏天,曾常宁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沙小泉有一天到我家,常德道1号找我。她来了一进门,就告诉我说刘仁同志让我找你。”除了抓紧做傅作义的工作,沙小泉还传达了另一项任务,“利用曾延毅的一切关系,从现在开始迎接解放,搞情报。”曾常宁说(出自1999年采访资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

李云撰文

料)。

为了获得情报,曾延毅父女联袂完成一次次“惊险任务”。此外,在父亲的帮助下,曾常宁还获取了国民党军“塘沽城防图”和天津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的有关情况。这些情报在后来的天津解放的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解放军在平津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经过多方有力的说服工作,傅作义终于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解说词

红色记忆系列特稿